

· 笔 谈 ·

# 当代史学思潮 与流派系列反思·医疗史

编者按：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集，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思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之知识创建汇入人类整体知识洪流。系列反思第四辑以“医疗史”为主题，邀请国内外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医疗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 “传染病的中国史”诸问题探讨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历史系教授 饭岛涉

本文以与年轻学者对话的形式进行论述，探究将传染病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帮助解决中国史的哪些问题，以及有关历史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认识。虽然对话具有假想性，但不论问题或回答，均是对长期研究经验和与同行交流的总结。

### 一、我为何以传染病作为课题

人类为了守护生命一直在与传染病作斗争，最终消灭了天花，也能够抑制霍乱和结核病等。但是，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因为传染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所以也许已经无法充分理解其意义。在这个大环境下，21 世纪初爆发了 SARS，这种对人类来说未知的传染病被称为新兴传染病。新型流感也是其中的一种。

在世界各地，人们对 SARS 给生活和意识带来的巨大影响还记忆犹新。中国因 SARS 的爆发，已以此为契机开始进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本文以“传染病的中国史”为主题，也是考虑到历史上如 SARS 般的传染病屡次流行，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学也是以攻克传染病为目的而实现了体系化。

传统的历史学几乎并未注意到这一事实。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原本学习中国近代社会经

济史，主要研究清末民初的海关税和厘金税，也就此问题写过研究论文。读研究生时，因阅读海关相关资料，初次接触到“传染病的中国史”。中国海关的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传染病的记载，如霍乱和鼠疫，因为海关是征税机关，同时也是防治传染病的防疫机关。这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还是让刚开始中国史研究的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最初只想到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有经济政策、企业经营、商品流通和征税。其实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治鼠疫和霍乱这样的传染病。

## 二、我的研究对象是哪些传染病

天花应该是中国史上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霍乱也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它是起源于印度的传染病，19世纪初流入中国。

“传染病的中国史”研究对象很多。我被“传染”了鼠疫、疟疾及日本血吸虫病这三种，其中关于鼠疫和疟疾已经总结成书，应该已经被“治愈”了。

腺鼠疫是最初起源于云南的传染病，由于贸易和人口流动，19世纪扩散至广东全境，1894年在香港大肆蔓延。由于香港是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的枢纽，所以腺鼠疫又从香港蔓延到厦门、上海、天津、台湾等地，以及日本的通商港口。此后，腺鼠疫从东南亚向印度和非洲扩散。以香港为起点的腺鼠疫的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都有深刻关系。

正如Benedict所阐明的，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这一时期的腺鼠疫并没有对整体人口动态产生较大影响，这一传统理解的研究背景是欧洲因鼠疫流行而失去约三分之一的人口。<sup>①</sup>然而，并不能仅仅从传染病对人口动态的影响来考虑问题。腺鼠疫的流行给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1910年至1911年，东北地区及周边肺鼠疫流行。肺鼠疫是从西伯利亚被带到中国的，与起源于云南的腺鼠疫属于不同种类。这次肺鼠疫流行导致约五万人死亡，国际方面也于1911年4月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会议商议对策。就这样，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鼠疫对策为契机，中国开始着手医疗和卫生事业的近代化，我将其称为“卫生的制度化”。<sup>②</sup>

在即将“治愈”鼠疫时，我又“患上”了新的传染病，这便是疟疾。疟疾流行目前以非洲为中心，是一种导致大量人群感染、并夺去很多儿童生命的主要传染病，中国南方也有过较大规模的疟疾流行。但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等地也曾流行疟疾，则较不为人所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推行使用DDT消灭疟疾的媒介——蚊，有一些地区因此消灭了疟疾，包括中国台湾和日本冲绳。台湾和冲绳推行相同的疟疾对策，其背景是日本曾占据台湾与二战后美军的干预。以此为例，我论述了疟疾防治措施中所体现的地域秩序。<sup>③</sup>

现在我所“感染”的，是日本血吸虫病。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寄生虫病，除中国外还在日本和菲律宾流行过。那么，为何这一疾病会被冠上“日本”之名呢？虽然它常常被误解为起源于日本，但其实是因为20世纪初日本研究寄生虫的学者发现了日本血吸虫与其传染媒

①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

③ 飯島涉：《マラリアと帝国——植民地医学と東アジアの広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介——贝，因此才会被称为日本血吸虫病。

“传染病的中国史”研究对象多为急性传染病。由于急性传染病的流行会夺去大量生命，对历史造成巨大影响，所以很容易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

与急性传染病同样被历史学家重视的还有性病和麻风病。比起其作为致死疾病之意义，性病作为性传染病在社会规范与卖淫等方面更被重视；而麻风病因为患者需要隔离，所以是从其强制性与社会秩序层面被关注、研究的传染病。

在中国史上，也有重要疾病却几乎没有被研究过的传染病，例如结核病。结核在20世纪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致死疾病，而且因其与工业化、都市化等社会变迁紧密相关，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艾滋病，是在我的学生时代新兴的传染病。艾滋病不仅对人口动态造成很大影响，在社会规范和文化上也引发了各种问题，幸运的是现在已逐渐被有效抑制。从这一层面上，艾滋病也在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此处稍微转换一下视角。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到人类所感染的传染病，这便是问题，动物和植物的传染病或人兽间共通的传染病也很重要。如果动物中传染病流行，那么作为食物或为农耕使用的家畜都会被波及。动物传染病中疯牛病很有名；植物传染病中，可以列举造成爱尔兰饥荒的土豆传染病。

在中国历史学界，“传染病的中国史”已开始受到关注，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生选择传染病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历史研究》组织这一笔谈，也可以说是证据之一吧。

在日本，最初受到欧洲史研究的影响，学习其研究方法，开始了“传染病的日本史”和“传染病的中国史”之研究。日本有名为 ASSHM (Asian Society for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的研究组织，定期举办研究会。ASSHM 所召集的年轻研究者中，也有人研究“传染病的中国史”，产生了如福士由纪《近代上海与公众卫生——防疫的都市社会史》等研究成果。<sup>①</sup> 另外，韩国也是有中国史研究传统的国家之一，也在研究“传染病的中国史”。

### 三、“传染病的中国史”等于医学史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在日本，推动医学史 (History of Medicine) 研究的大多是专攻医学、实际从事医疗活动 (或有从业经验) 的医师。日本医史学会发行名为《日本医史学杂志》的学术刊物。

“传染病的中国史”是用与医学史稍有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医学史研究与科学史研究 (History of Science) 一样，都是研究“大科学”的发达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例如能够预防和治愈传染病的疫苗的发明，它对攻克传染病作出巨大贡献，因此成为医学史和科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以消灭天花的种痘为例，它是如何被发明，又作出了哪些贡献，就是研究课题的中心。

与此相对，“传染病的中国史”是从另外的角度看待天花。人们并不是马上就接受种痘，尤其是女性，对种痘有相当程度的抗拒。人们关于种痘的意识，正是文化问题，而且在很多地区，种痘是通过小学教育等实施普及的，从社会制度等方面来看待天花，正是医疗社会史 (Social

<sup>①</sup> 福士由纪：《近代上海と公衆衛生——防疫の都市社会史》，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0年。

History of Medicine) 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传染病的中国史”在很多时候都是以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 四、我受到哪些研究者的影响

我的“原籍”是中国史,因而在众多中国史研究前辈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着研究,但现在我“住”在医疗社会史的世界里。下面介绍我在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曾受其影响的先哲。

20 世纪 80 年代,我开始学习中国史,当时日本几乎没有人研究“传染病的中国史”。在这种环境下,我从欧洲史研究中学习方法。对“传染病的历史学”产生兴趣的契机,是阿部谨也《哈默尔恩吹笛人——传说与那个世界》一书。<sup>①</sup>这本书以德意志小城哈默尔恩流传的能捉老鼠的吹笛人传说引出问题,而捉老鼠的男人与欧洲中世纪流行的鼠疫有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中国留学期间偶然读到该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感谢这本书,让我对“传染病的历史学”产生了兴趣。最近有机会探访哈默尔恩,感慨良多。

从专门研究的意义上来讲,应该是麦克尼尔的《疾病与世界史》对我影响最大。<sup>②</sup>该书提出了非常大胆的观点,即统治着云南的蒙古帝国将鼠疫传播到欧洲。最后还附有中国传染病的历史年表,出自作者拜托其中国友人翻译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sup>③</sup>在麦克尼尔看来,在如此长的时间轴中,可以确认传染病的流行,其社会存在本身即令人惊叹。

1991 年我写出第一篇关于鼠疫的研究论文,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生时期的学习为此打下了基础。这个时期,我非常孤独地进行着“传染病的中国史”研究,本国学者中帮助我的是英国传染病史研究专家见市雅俊和印度传染病史研究专家胁村孝平。像这样突破地域局限、从前辈处学到医疗社会史和“传染病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有意义。

#### 五、“传染病的历史学”有何作用

这也是个重要问题,与“历史学有用吗”这一问题也是相关的。我认为历史学应该意识到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为社会作各种贡献,即“历史学是有用的”。传统的历史学重视确认史实与阐发深入见解,这非常重要,发现史实是非常有趣的,但不应停步于此。考虑社会性作用也是有必要的,这是我现在的立场。

那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20 世纪,随着传染病研究的进展,种痘的普及,天花被消灭;随着抗生素的发现、预防医学的发达和医疗的进步,人们开始认为传染病是可以克服的。

然而,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乐观。人类能够消灭的实际上只有天花;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新兴传染病也逐渐出现。由于抗药性等因素,传染病的抑制变得困难,一部分可以抑制的传染病又再次复活,相当于传染病再次蔓延。21 世纪被称作“传染病的世纪”,很多人又认为传染病的抑制很困难,只能尽量控制其发生。传染病的流行被病原菌和媒介动物的状况所左右,但同时

① 阿部谨也:《ハーメルンの笛吹き男——伝説とその世界》,東京:平凡社,1974 年。

②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6; 日文版为:《疫病と世界史》,佐々木昭夫訳,東京:新潮社,1985 年。此处是根据日文版翻译的。

③ 陈高佣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1986 年影印暨南大学 1939 年版。

也是社会问题：即为了抑制传染病，有必要在社会医学领域将我们的生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

以疟疾为例。前已述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 DDT 的正式使用，媒介蚊得到了抑制，疟疾的流行似乎要终止了，事实上也的确有部分地区成功消灭了疟疾。然而，通过农业等对生态系统的介入而左右疟疾的流行，完全根除非常困难，世界性疟疾再发变得很明显。其中，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疟疾疫苗开发成为焦点；同时，抑制媒介蚊也是重要方法，“传染病的历史学”能够为这样的课题提供各种信息。日本有冲绳西表岛和石垣岛消灭疟疾的详细记录，可以从流行病学角度验证消灭疟疾的过程。中国也保存着大量抑制包括疟疾在内的各种传染病的记录。各地档案馆中留存着很多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对策的第一手资料，有待于从“传染病的历史学”的角度被研究。

这种研究展示出历史学这一人文科学研究，与医学及公共卫生、动物学、医疗信息这些自然科学研究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是研究传染病历史的知名学者之一，他用“细菌统一世界”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来说明传染病的传播；<sup>①</sup>他还重视气候变动的历史，是引领环境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学者。勒华拉杜里曾经说，“历史学家的重要工作，是给科学家提供信息”。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传染病的历史学”。

## 六、“传染病的中国史”可以对中国史研究作出的贡献

“传染病的中国史”，并非以传统历史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物等作为直接研究对象；其手法也与医学史、科学史不同，可以通过思考传染病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用与以往不同的视角来描绘历史。

通过对“传染病的中国史”的研究，我强烈意识到：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社会中，各种传染病肆虐，而且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人们为了抑制传染病作出过各种努力。其中当然有地域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但传染病通过世界一体化而全球化，因此传染病对策也可以实现国际标准化，具有很强的共通性。“传染病的中国史”是“传染病的历史学”之重要部分，对传染病的反应中有以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个别性。也就是说，欧洲、非洲、美国、印度、东南亚、朝鲜和日本等各有其特殊性，但同时，他们的共通性也很显著。

“传染病的历史学”，并不仅是“传染病的中国史”或“传染病的日本史”，而是有必要写成“传染病的全球史”。这也正是我认为“传染病的中国史”对“传染病的历史学”贡献巨大的原因所在。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历史系徐慧译，山东大学日语系张雯校）

<sup>①</sup>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 Paris: Gallimard, 1973; 日译本: E. ルロアラ デュリ:《新しい歴史——歴史人類学への道》, 樺山紘一ほか訳, 東京: 新評論, 1980 年。